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四二期 ——  
(二〇一四年五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405b)

---

【往事回首】	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杨 敏
【千秋功罪】	造反派的基本特点是背靠毛泽东的支持冲击“走资派”	印红标
【历史问责】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	章立凡
【史海钩沉】	李仲公“伪造贺龙信件”之疑	李 芳
【读史札记】	评党校教授的一篇漏洞百出的作文	文 贝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往事回首】

### 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

• 杨 敏 •

“回首在罗瑞卿专案组的日子，虽然已相隔近半个世纪，张英华仍然深觉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的审查。”

1966年底，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接到总政通知，要求派出一名副处长，参加中央专案办公室的工作。

12月29日，时任总政保卫部第四处副处长、42岁的张英华被总政保卫部副部长郝苏找去谈话。此前，张英华曾多次参与对干部的政治审查，还曾参加过“黄克诚专案组”，属于“党最信任的那类人”。

“郝副部长说，让我参加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明天到‘三座门’报到，接受新任务。”在

国防大学第一干休所，今年九十高龄的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张英华瘦高的个头，浓重的河北口音，多年的保卫工作训练了他非凡的记忆力。上世纪90年代，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计算机用户，多年来，习惯于每天晨起浏览新闻、回复邮件。

回首这次特殊任务，虽然已相隔近半个世纪，他仍然深觉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和残酷。

#### ◇ 进专案组

12月30日，张英华一早就到俗称“三座门”的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报到。

会议由总政治部主任兼军委副秘书长肖华主持，参加者为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郑瀚浩、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柴瑞林、总参谋部作战部副处长王亚志、原罗瑞卿办公室秘书邓汀、公安部的一位副局长，以及张英华，共7人。

肖华首先讲话。他说：“康生同志几次来电话，督促我们成立罗瑞卿专案组。今天到会的同志都是专案组的成员，我们这个专案组就算正式成立了。”

会上规定了保密原则：办案内容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片纸只字不能带出；会议和外调记录一律记在保密手册上，有页码有编号，用完上交；专案之间不能串通，等等。

专案组的办公地点设在国防部大楼的肖华办公室，专案组人员对外称“肖办秘书”。

专案组的第一件事，是搜集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以及1966年4月公安部揭发、全军批判罗瑞卿会议的材料。

1965年12月，正在昆明巡视的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急召至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批判为“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

1966年3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罗瑞卿的批判升级。3月18日，罗跳楼自杀，造成双脚跟骨粉碎性骨折。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称其“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是“埋藏在我们党内的‘定时炸弹’”。

5月18日，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正式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审查小组，对四人进行审查。其中，罗瑞卿案由军委处理。

根据搜集的这些材料，专案组对罗瑞卿的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不突出政治”“抢班夺权”等几类。之后，又以1949年划线，将审查内容分为两部分：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表现（包括个人政治历史）和解放后主持公安、军队工作时的路线错误。

由于专案组缺乏公安系统的人员，1967年5月起，又从公安部陆续调进5个人，其中就有公安部二局一处的副科长汪春耀。

“我当时就是公安部一个副科级干部，做梦也没想到，竟参加了对老部长（罗瑞卿1949年至1959年任公安部长）的审查。”在公安部离退休干部局官园支部活动室，84岁的汪

春耀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但当然还是觉得有点荣誉感的。凡是抽调进专案组的人，无论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工作能力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

#### ◇ 赴川外调

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主要负责审查罗瑞卿 1929 年以前的历史。

在 1966 年 3 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上，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写了一份揭发材料，对罗瑞卿未参加南昌起义一事提出了质疑。“他到哪里了？这段历史应该审查清楚。”为此，专案组决定派张英华到广州调查。

1967 年 6 月，张英华赴广州。大街上到处都贴着大标语“打倒广老谭”，后来他才知道，“广老谭”就是黄永胜，意为“广州的谭震林”。

到广州第二天晚上，张英华见到了黄永胜。他觉得黄永胜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还不时说几句玩笑话。他没想到，一年后，黄接替杨成武当了军委办事组组长，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

黄永胜说，1927 年时他并不认识罗瑞卿，后来才知道罗当时在武汉黄埔军校分校学习，他自己则是在中央警卫团当战士。1927 年 7 月下旬，军校和中央警卫团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南昌起义，但罗却没参加。他对此感到怀疑，因而写了份揭发材料。除此之外，他也没有更多的线索。

从广州回京后，专案组从中组部借出了罗瑞卿的档案查看。张英华等人果然在其中发现了一些疑点，如：关于罗瑞卿 1926 年加入共青团一事，几份材料上的介绍人均不相同；入党介绍人，解放前后填写的也不同。

1967 年 7 月和 10 月，王亚志和汪春耀两次入川，向所涉及的几位证人进行调查。汪春耀觉得王亚志军事知识非常渊博，暗自佩服，但当时并不知道，他曾经做过彭德怀的秘书和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调查发现，罗瑞卿所填的三个入党介绍人中，陈刚秉和任伯芳都已过世，只剩潘先知。经过四处寻访，他们终于打听到，潘先知当时在四川合川县政协担任秘书长。

他们连夜去合川统战部查阅了潘的档案。在其自传和干部登记表中，多处写到他与罗瑞卿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同学，“感情甚笃”等。但是，没有发现潘曾经介绍他加入中共的只言片语。

第二天，他们找潘先知谈话。潘大讲与罗的关系如何密切，但他承认，在得知罗担任了公安部长后，给罗写过信，没有回音。

“我们推想，这可能就是罗把入党介绍人从潘先知改为任伯芳的原因。”汪春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与此同时，张英华等人在北京、沈阳和哈尔滨等地也展开了调查，取得了大量的旁证材料。两组人员将材料仔细核对后，基本勾勒出了当时的情况：

1927 年底，罗瑞卿离开汉口四川会馆到湘西常德，在国民党的杂牌部队“新编教导第

五师政治部”当了一名“上尉宣传员”。不到半年，罗去了长沙，正赶上长沙“马日事变”，立刻乘轮船赴南京，于1928年7、8月份间到了上海。

在上海，罗瑞卿遇见同乡任伯芳，两人相处甚好。任伯芳刚刚与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关系，罗向其请教之后，写信给中共中央，说自己在武汉黄埔军校时入了党，后来与党失去联系，要求恢复党的关系，证明人为任伯芳。

当时大革命失败，许多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纷纷来到上海寻找组织关系。罗的信送上去没几天，就收到通知，让他在外滩公园手持报纸，等人来接头。

来人是中共中央军委秘书欧阳钦，在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告诉罗组织关系已经恢复，以后与一位陈姓同志联系。

就这样，罗瑞卿入党了。

#### ◇ “二办”成立

1967年夏，风云变幻。

8月11日，造反派贴出“肖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肖华倒台。8月17日，“军委办事组”成立，取代了军委办公会议。9月下旬，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任副组长。

据杨成武后来在《我知道的中央专案组“二办”》中回忆，罗瑞卿专案组代号为507，成立之初负责人是周恩来。1967年9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主持召开中央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指示清理专案，以便让没有问题的老同志参加初步定于1968年举行的中共“九大”。

会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南海怀仁堂西大厅召集会议，作出部署：原来由谢富治主管的专案办公室，改称“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简称“一办”，中央党政机关审查对象划归“一办”。军事系统审查对象则划归“二办”，由杨成武负责，下设饶漱石案、彭（德怀）黄（克诚）案、罗瑞卿案、贺龙案等10个组。一办的后勤保障、办公费用等仍由中央办公厅负责，“二办”由军委办公厅负责。

10月25日，杨成武召集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二办”正式开张。会上确定，二炮政委李天焕、军委办公厅副主任金涛、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成学俞三人兼任“二办”副主任。

为了充实力量，二办先从驻京的总参、总政等机关选调干部，随后又向北京、广州等军区发电，要求报送“政治思想品质好、历史清楚、懂政策、守纪律、工作能力强、没有参加群众造反组织的比较优秀的干部”。到1967年底，陆续有100多名干部调来“二办”，但仍未按计划调齐。

“二办”成立后，总参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许心荣担任了罗瑞卿组副组长，又从海军、空军和各大军区调来6人，原来的人员部分退回原单位。办公地点从肖华办公室搬到翠微路的总参招待所。

张英华成了留用人员。“他们既不放心我，但又离不开我。因为在组内我了解案情，熟悉公

安业务，属于业务骨干。”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两个月后，张英华被增补为副组长。

#### ◇ 审问罗瑞卿

外调回来后，1967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张英华、王亚志和汪春耀三人到罗道庄审问了罗瑞卿。

当时，罗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警卫某师一个连队的院子里。与罗瑞卿一同关押在此的，还有彭德怀、彭真、谭政、刘仁、万里等人。每人一间斗室，走廊上设哨兵。室内一张木床，一桌一凳，窗户上糊着纸。

审讯间在一座小平房里，大概十二三平方米，摆设简陋，只有一张桌子、几个凳子和一个暖水瓶。

为了这次“交锋”，事先他们作了充分准备。怎么提问、什么时候举证都做了设想，对可能遇到的情况都预想了应对的办法。

穿一身旧军装的罗瑞卿被警卫搀扶进来。他神色平静，但透着机警。

待罗瑞卿坐下后，张英华开门见山地问：“你入过团吗？”他注意到，罗惊了一下，但很快就镇静下来。

“这个问题，我作交代，我没入过。”罗承认，他在干部登记表中所写的，1926年在四川南充中学时由一个老师介绍加入共青团，不是事实。

张英华有点意外，很快又问：“你入过党吗？”罗瑞卿沉默下来，好一阵不说话。

“诸位，今天就不要再问了，我讲吧。”罗瑞卿抬起头来，“以前写的简历中入党地点和时间不是事实。”

张英华和王亚志说了一些鼓励的话，给他纸笔，让他写了一份简要材料。在结尾，他写上了“认罪”二字。写的时候，他一反往常的平静神态，显得有点激动，手略微发抖。字比较大，共写了两页纸，200字左右。

张英华将这份“认罪书”上报至军委办事组。在罗案久攻不下时，这显然属于“阶段性硕果”。

几天之后，11月19日，军委办事组在京西宾馆召开驻京部队高级干部会议。张英华记得，主持会议的吴法宪称：“杨代总长的《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那篇文章发表之后，威力之大，就像大炮一样，把罗瑞卿的堡垒轰出缺口了，他承认自己是假党员了。”

但在张英华和王亚志等人看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后，全国各地都陷入白色恐怖，罗瑞卿却冒着生命危险到处找党，实属难能可贵，应当认定为“因入党心切，而手续并不完备”。

#### ◇ “特务”问题

专案组的另一个审查重点是罗瑞卿的所谓“特务问题”。

1967年7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罗瑞卿在延安时的老婆拱平是特务，现在在南京。当月，张英华等四人去南京，将在一所中学工作的拱平带回了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看押。此后的两三个月，张英华等人几乎每天去审问拱平。

据专案组了解，在延安时期，在“抗大”担任教育长的罗瑞卿与抗大学员拱平结婚。不久，拱平称有病要去西安治疗，之后一直未归，后来进入了国民党的《黄埔日报》当记者，与《中央日报》的一名记者结婚。但经调查，没有发现拱平曾从事过特务工作。

年底，从“二办”又转来一份揭发材料。上海监狱中在押的一名老中统特务称，上海刚解放时，他曾在街上遇到另一个中统特务杨宝昌，杨偷偷告诉他：“公安部的罗部长也是我们的人。”

随后，杨宝昌被押解来京，由专案组负责审讯。但调查显示，杨根本没有可能与罗瑞卿相识。

11月，罗瑞卿住进解放军301医院，治疗左股股颈骨折旧伤。1968年2月9日，专案组给杨成武、李天焕写了一份报告，称如让罗瑞卿继续住在医院里，对审讯十分不利。“他吃住舒服，拒不认罪，为了突击审讯其特务问题，我们建议立即出院。”2月11日，在专案组的命令下，罗瑞卿被迫出院。

“那份报告是李天焕亲自到专案组授意的。我们当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写成了那份报告。这就是那份报告出笼的全过程。”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月16日，专案组在《关于对前段工作的检查和今后工作的任务》的总结材料中承认，罗瑞卿的“特务问题”经过45次审讯，仍未突破。“我们决定树立必胜信心，连续审讯，开展强大攻势，从政治上把他打倒。”

27日，在由张英华担任主审的一次讯问中，对于罗在1928年1月至6月期间所担任的国民党“新编教导第五师政治部”上尉宣传员的性质，办案人员和罗瑞卿发生了激烈冲突。

办案人员认为这段历史应属于反革命历史，罗瑞卿坚决不同意。在僵持不下时，有的办案人员辱骂罗为“死硬派”，说“一切反动派都是愚蠢的，你就是最愚蠢的”。

罗瑞卿终于失去了平静，愤怒而绝望地喊道：“毛主席啊，有什么办法？逼着我写我就写吧，写了死了就算了，死了我还要申诉，毛主席你老人家知道不知道！”

张英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公安部对国民党“军政警宪特”的认定标准，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上尉以上军官的属于“五类分子”，但罗瑞卿任国民党上尉是1928年。所以，最后没有对他的这段经历做出“历史反革命”的结论。

#### ◇ 被撵出专案组

1968年3月，中国政坛再起波澜，“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打倒。黄永胜出任总参谋长，兼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吴法宪接任“二办”负责人。

罗瑞卿专案组人员又一次进行了大调整。汪春耀等5人回公安部参加学习班，海军航空兵后勤部政委张晓山调任常务副组长。许心荣、张英华仍为副组长。办公室由翠微路招待所，搬到了京西宾馆九层。

5月，专案组写了一份报告，称没有发现拱平是特务的有力证据，建议把她放回南京，由原单位继续审查。“实际上就是把她放了，她没问题。”对于杨宝昌，专案组也做出了结论：罗瑞卿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10月底，在专案组的一次党支部委员会上，有人提出：“在专案组内存在着一种严重的右倾思想，有的人精神状态有问题，需要进行批判。”理由是，许心荣、张英华和王亚志等几人多次写报告，要求给不够逮捕条件的审查对象降格，改为拘留、监护，或送回原单位审查；同意罗瑞卿住院治疗；给审查对象送“毛选”、订《人民日报》；送老花镜和生活用品等。为此，三人被批判为“包庇敌人”“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王亚志因曾当过彭德怀办公室的秘书，就更被怀疑为安插到专案组内的“坐探”和“钉子”。

11月27日，三人被撵出了专案组。许心荣回总参，后被分配到新疆军区工作；张英华回已被“军管”的总政，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王亚志被押送回总参，后发配“五七干校”劳动。

对罗瑞卿的审讯持续到1968年底。1969年1月，罗瑞卿终于获准入院治疗，做了截肢手术。1973年，被解除“监护”。

1975年8月，罗瑞卿被任命为军委顾问，1977年，复任中央军委秘书长。

#### ◇ 三次审查

文革结束后，中央专案组办案人员经历了多次异常严格的政治审查。

1976年到1978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总政保卫部组成了“七号办公室”，以审查曾在中央专案组“一办”“二办”和“三办”（1968年成立，主要负责公检法系统的干部）搞过专案的人员。对张英华的审查结果为：没有问题，可不做结论。

1982年至1984年张英华任军事学院（国防大学前身）院务部副政委期间，根据中央对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进行严格审查的指示，军事学院党委组成调查小组，对张英华在罗案组的问题进行审查。最后认定，张英华在专案组期间表现良好，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抵制错误的东西。

1984年9月18日，全军整党办公室发出《关于调查原中央专案小组第一、二、三办公室军队办案人员的通知》。由总参牵头，总政、总后、海军、空军、二炮及各大军区组成“联合调查组”。这次调查，耗时、耗资之巨，远超前两次。

在这次调查中，对张英华所做的结论依然是“没有问题，不做文字结论”。不过，他被认为对1968年2月27日那次审讯（对罗瑞卿使用了带有侮辱性的言辞）“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1984年整党期间，公安部举办“一、二、三办专案人员轮训班”，共283人参加。汪春耀成为该部参加过中央专案组的人员中，少数几个没有进轮训班的。

~~~~~  
【千秋功罪】

造反派的基本特点是背靠毛泽东的支持冲击“走资派”

• 印红标 •

凤凰历史：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印红标：红卫兵中的第三个派别是造反派。我这里讲的“造反派”是文革中与老红卫兵保守派对立的红卫兵派别，是“造反派”一词的原意，不是泛指“造反的人们”，也不是文革后被打造成“作恶者”统称的概念。造反派的基本特点是冲击“走资派”。他们背靠毛泽东的支持，将矛头指向当权派、走资派。他们高举“平反”的旗帜赢得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源于工作组对他们的打压。

在大学，造反派的核心成员是与工作组有矛盾和冲突，被打成“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的学生。他们质疑工作组的政策，有的认为运动不够轰轰烈烈，比工作组的主张还要激烈，有的对工作组的具体作法持不同看法，于是被工作组认定是对运动的干扰，遭到批判和打击。

工作组沿用传统的模式领导运动，主要是两个经验，一个是“反右派”斗争，一个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称“四清”）。所谓“反右派”的模式就是将主要矛头指向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坚持党组织和干部的领导，谁违抗党委、工作组，谁就是反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模式主要是整基层领导人和地主、富农等既有阶级敌人。文革偏偏要求矛头向上，指向中央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

毛泽东指责工作组整群众、整学生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要求为被工作组、党委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平反。平反能赢得一般群众的拥护。例如：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挑战工作组权威，于是工作组搞“反蒯”运动，组织反蒯游行，限制蒯大富的人身自由，连同情蒯大富的人都被批评，这就太过了。工作组贯彻的是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政策，批工作组，批工作组的上级党委，再往上追究就到了中央的决策者刘少奇。

在中学，多数老师是造反派。根据1957年反右派的经验，在中学生里基本不定右派，主要整老师和校领导。在文化革命初期，刘少奇还针对这一传统政策，专门提出：反工作组的个别高中学生也可以定右派。由于对中学生一般不定右派，工作组跟中学生之间的冲突不大。工作组不整中学生整教师，鼓励给中学领导和老师贴大字报，组织老师集中学习，检讨自己，“上楼下楼、洗手洗脚”（社教运动作法）。因此，后来很多教师跟反对“血统论”的中学生造反派站在一起。

◇ 老红卫兵被逐出政治舞台时曾放话：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

印红标：造反派思想另一个特点是反对“血统论”，这是中学造反派与老红卫兵之间的主要冲突点。中学造反派主要是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压抑、排挤的学生。

老红卫兵认为文化革命要打击知识分子和经典的阶级敌人，所谓经典就是按照旧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划分的阶级敌人，如地主、富农，还有属于剥削阶级的资本家。这些阶级是私



有制的产物，而造反派要打击的领导干部则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掌握整个社会资源而缺乏监督的走资派。

1966年秋冬之后，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逐渐压倒老红卫兵和保守派，占据了优势。红卫兵运动的内核随之发生微妙的变化，从主要造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的反转变为主要造党政领导干部的反。毛泽东终于调动了一批为摆脱压抑和歧视，不顾一切地跟随他进行文革的群众。而在老红卫兵眼里，杂七杂八出身的造反派怎能配得上红卫兵的称号？1967年4月，老红卫兵被逐出政治舞台的时候给造反派撂下这样的话：“干部子弟要掌权！天下是我们的！”“二十年后的世界是我们干部子弟的！”——等着瞧！

造反派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谴责，与现今社会对所谓“红二代”接班的诟病，如出一辙，不同的是，造反派打着毛泽东文革的旗帜，现在人们的理念趋于多样，但问题依旧。

#### ◇ 造反派来自政治和社会的边缘群体

凤凰历史：造反派有哪些政治和社会特征呢？

印红标：造反派主要来自政治和社会边缘群体，就是说，他们本人（大学生）或者家庭（中学生）不属于政权的核心成员，不是领导干部。他们本人政治上离政权比较远，比如他们不是重点的政治培养对象，工作组也不太信任他们，甚至排拒他们。或者他们的家庭属于政治的边缘群体，主要是旧中国的中上阶级，例如：知识分子、职员、小业主、小商人、中农等。

相对于领导干部子女，造反派可以被称作“平民子女派”。但是历史有其复杂性。文革开始时，新旧政权的更迭仅17年，相对于共产党新当权派子弟的“平民子弟”，却有不少是旧中国小资产者以上阶级的子女，比如教授、医生、工程师子女。

北京海淀区和西城区的中学，是老红卫兵和造反派冲突激烈的地方，是分属于两类大院的子弟冲突的地方。在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四中、八中，师大女附中、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多来自党政军领导机关大院，与其对立的激进造反派，所谓四三派，则以科学院、研究院、高等院校大院子弟为多。这种冲突具有社会性，中学造反派从批判干部子弟的特权，比如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注意到领导干部的特权。因此，中学生的探索比较有社会性，但偏离文革的主题；而大学生造反派更符合中央的意图，按两个路线斗争的模式批刘少奇和其他干部，争论究竟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是刘少奇司令部的人，或者谁是否叛变过革命。

造反派在取得优势之后，内部的政治和思想斗争凸显。造反派内部有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区别。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中，激进派强调继续革命，温和派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因此主张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文革前17年不是一无是处，而是以“红线”为主。

#### ◇ 激进造反派符合毛泽东的文革理论，温和派则符合毛泽东的具体部署

凤凰历史：据您的研究，毛泽东对这两派红卫兵究竟持什么态度？

印红标：造反派内部的分裂，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或反对哪一派，他总的原则是大联合。但对于清华的“四派”和“团派”（编者注：“四派”的全称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四一四总部，“团派”全称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说过他不同意“四派”观点，但是也没说支持“团派”，而且实际上打击“团派”的“黑手”正是他本人。

“四派”和“团派”是在工作组扶植的保守派垮台之后公开分裂的。在理论方面，激进的“团派”在辩论中强调反对“走资派”的必要性，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坚持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中最具锋芒的核心、并在中共党内受到诸多质疑或抵制的内容，也是毛泽东最要坚持的内容。而温和的“四派”则是强调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中条件性、保证性或策略性的内容（如无产阶级专政），与文革前的阶级斗争理论有较多交集，是党内争议相对缓和的内容。例如：激进的“团派”强调文化革命的必要性：中国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生复辟的危险；温和的“四派”则强调文革毕竟是在中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在毛主席领导下发生的，共产党的天下没有变，所以大部分干部还是好的。

在文革运动的形势和具体部署方面，温和派的稳健、保守主张，诸如批评“极左”、反对冲击军队、要求团结多数干部等主张有利于稳住局面，比较符合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在1967年夏季以后由乱到治的“战略部署”。所以，毛泽东接见“五大领袖”时，虽然表示倾向“团派”，不赞同“四一四思潮必胜”，表现了毛泽东思想层面上的好恶；但是也没有严厉批评“四派”，还指示释放《四一四思潮必胜》的作者周泉缨，这应当是出自结束群众造反运动的考虑。

1968年7月28，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领袖时，结束红卫兵运动的意向已经十分清楚。

凤凰历史：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左”一向是进步、革命的，而“右”是落后、反动的，但为什么被称为极左“新思潮”的红卫兵在文革中却遭到批判？

印红标：在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左是正面的，极“左”就是错误的了。因此，在极左的“左”字上加引号，表示是所谓的“左”，不是真正的左。

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为毛泽东的文革部署，左和右的坐标与文革前的常态不同，出现了坐标转变，左右异位。

文革前的左派指依靠党组织、出身好、听本单位领导指挥的党团员、积极分子等。而到了文革，持这样态度的人因为不理解毛泽东冲击当权派、炮打司令部的意图，就成了右倾的保守派。而挑战领导权威的人在文革前是右派，1957年很多人因此被打成右派，甚至批评党支部书记就成了右派。但是时过境迁，到了文革，毛泽东号召群众冲击党政领导，揪出其中的走资派，于是被地方基层领导视为“右派”、“反革命”的很多人成了造反派，成了左派。所以左和右都是相对的，由于文化革命中毛泽东的斗争目标发生了变化了，左和右的标准就不一样。左右的坐标的基准是毛泽东的意志，顺从毛泽东的是左派，违逆毛泽东的是右派。

文革中的“极左”思潮指那些提出比毛泽东的中央更左，从左的方面干扰毛泽东部署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活动。其中“516兵团”在思想方面意义不大，而以湖南“省无联”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为代表的极左思潮，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 极左派要推翻“官僚特权阶层的统治”违背了毛泽东的意图

凤凰历史：极左“新思潮”的红卫兵对广大网友来说一直鲜有耳闻，您能否以代表人物，比如杨曦光为例，为网友们解释一下他与毛泽东在对文革的判断、对社会的分析上究竟有何不同呢？

印红标：第四种派别是极左派和极左思潮，是学生中的思潮，自称红卫兵，然而是否列入红卫兵思潮，尚可讨论，因为他们已经偏离红卫兵运动的主流很远，并且影响十分有限。

杨曦光是个充满了矛盾色彩的奇人，高干子弟、抨击官僚体制、极左思潮，高中一年级学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杨曦光原名叫杨小凯（杨曦光是原名，杨小凯是文革后的名字——编注），1966年是湖南长沙一中高中一年级的学生，父亲是湖南省级领导干部，但是他的家庭经历了种种政治风雨。他的哥哥和舅舅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的父亲在1959年因为批评大跃进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1962年获平反。他的母亲对共产党内“左”的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杨曦光的父母就被湖南省委抛出来，进行批判和斗争。

因为父母的政治问题，杨曦光遭到保守派红卫兵的歧视，被工作组和党委打成反革命。他被高干子弟的圈子推出，进入了以批判领导干部、批判“血统论”为特征的造反派阵营，在1967年2月，还被押了一个多月。他是干部子弟里的异类。

概括地说，他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十七年，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动，接近形成或已经形成了官僚特权阶层。他把文化大革命描绘成人民大众与官僚特权阶层矛盾发展的产物，因而认为文化大革命不仅仅是政治革命，即他所说的“罢官革命”、“揪人运动”，而应当是推翻新的官僚特权阶层统治的社会革命。

杨曦光在《中国向何处去》等文章里写道：“现在90%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编者注：即下文提到的“红色”资本家阶级、“官僚特权阶层”或者“新生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群众揭发出来的事实和爆发的对他们的愤恨初步告诉人们，这个‘红色’资本家阶级已经完全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一个腐朽的阶级，他们与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阶级利益特权和高薪是建筑在广大人民群众受压抑和剥削的基础上。”

极左派说中国已经形成“官僚特权阶层”，就意味着中国和苏联一样都“变质”了。所以要发动社会革命，把“官僚特权阶层”打下去。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这个应当被推翻的阶级，就是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他们主张：文化大革命应当“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

这跟毛泽东的看法差异很大。1965年毛泽东曾经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但是很快改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形成稳定的概念。在整个文化革命群众运动激烈的前三年，毛泽东、中央文件、《人民日报》、中央领导人讲话都绝口不提“官僚主义者阶级”，显然是回避这个提法。在红卫兵编印的毛泽东未发表的讲话文稿中收录过包涵“官僚主义者阶级”一词的批示，但只是私下流传。不是正统的提法。任何正式场合都避免把走资派当作阶级和特权阶层批判。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即官方的解释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打垮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打倒“走资派”，而不是社会革命。

在文化革命后期，毛泽东垂垂老矣，他的文革受到党内普遍质疑的时候，《人民日报》才正式发表“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那是1974年，群众运动造反结束多年，也是阐发“新

的官僚资产阶级”概念的“极左派”被投入监狱多年之后。总之，毛泽东文革的目标不是推翻官僚统治，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以党内斗争为核心的政治革命。

#### ◇ 极左派希望以巴黎公社为理想模式改革政治制度

印红标：极左派的第二个观点是以巴黎公社为理想模式，提出政治制度变革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发动文革的时候，曾经给群众一个模糊的印象，似乎这次运动要向着巴黎公社的方向进行制度变革，给予人民群众更广泛的监督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权利。

《人民日报》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对巴黎公社原则做了一个解释，称巴黎公社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领导人，人民有权随时罢免官吏，官吏的工资不超过工人的工资，并说这是被马克思赞扬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巴黎公社的基本特征。人民日报没有明说的是：这几条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能够实现的。更没有指出：巴黎公社不是一党制，而是多种政治派别共存竞争的体制。马克思没有提出一党制，一党制是从列宁才开始，先后由苏共和中共所坚持的。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说：“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而在一人一票的公开选举中，党委的权力势必被弱化。书记是一票，普通学生、教员、工人也是一票。“让群众解放自己”实际上意味着摆脱党委、工作组的掌控。所以“二月抗争”中，老帅质问道：“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不知道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这就点到了关键，因为共产党的领导，通常是通过党的组织体系，由党的干部实施的，文革则鼓励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政治上共产党领导的制度，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掌握并享有政治、经济、社会支配权，主宰社会的稳固的集团，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特殊利益。文革触及了这些利益，但没有将其革除。

1966年11月3日，林彪在天安门群众大会上讲话说：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是不是有点政治改革的味道？但是当群众运动兴起，企图按照巴黎公社原则建立新的权力机构时，毛泽东和中央却不再提倡巴黎公社的原则了。毛泽东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于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变成了“三结合”协商产生的革命委员会。形象地说，群众从绝大多数变成了三分之一。再往后，随着党委的重建，连这三分之一也名存实亡了。这个演变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发生的。

有些批评者认为，所谓“巴黎公社”式的选举不过是动员群众的口号，到群众顺着这个口号让毛泽东兑现的时候，他就改口了。但是1967年的杨曦光还是尊崇毛泽东的，他不是“无限崇拜”，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发挥毛泽东的思想中符合他们一派思想的部分，可以说是“取我所需”。他还为毛泽东的改口做解释：毛泽东看到人们仍然不成熟，所以暂时妥协，等下一步再说。因为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不是一次，还要进行多次。他为毛泽东所做的解释是不是符合毛泽东的原意呢？恐怕不符合，否则怎么把他抓去坐大狱呢？杨曦光在这里无异于跟毛泽东争夺意识形态阐释权。谁说过大民主允许将毛泽东指示当作探讨的议题，说三道四呢？

#### ◇ 如果青年毛泽东生活在文革中恐怕会被抓进监狱

凤凰历史：现在也有人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是对直接民主的试验，您怎么看？

印红标：现在有的左派就是这么理解毛泽东，他们的某些观点跟四十多年前被毛泽东批判的极左派相近，但是不符合毛泽东在世时的思想。现在的左派如果活在毛泽东时代，如果还坚持这些观点，十有八九会被抓进监狱，因为他竟敢私自诠释毛泽东思想，那是犯忌讳的。而且还可以说，如果马克思生活在文革中，多半会因为思想“反动”即不拘一格的批判精神和大胆议论而被管治，乃至拖进监狱，如果青年毛泽东生活在文革中，恐怕会因言论出格，更可能因造反性格和行动被抓进监狱。老年毛泽东本人有思想，于是别人通常就只有贯彻、执行的份了。

极左派是执着地追求巴黎公社民主的理想主义青年。杨曦光的文章认为中国的政权与马克思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并无共同之处，中国已经形成了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新的特权阶级或者阶层。因此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层，重建巴黎公社那样的以民选为基础的政权。文革应当是制度的变化，目标是“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是在毛泽东的文革之外另设目标，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岂能容忍。

#### ◇ 毛泽东心目中的文革核心是党内斗争

印红标：极左派的第三个观点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具体目标和任务问题上，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革命委员会、反对军队。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指反对周恩来，因为周恩来的态度比较温和，在极左派要进行彻底革命的时候到处保护老干部。他们把周恩来视为阻碍社会革命、政治机构革命性变革的“中国‘红色’资本家阶级目前的总代表”。杨曦光对周恩来的反对，以对中国社会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性分析为依据，与“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主要从党内斗争的角度攻击周恩来有所不同。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新政权——革命委员会，极左派以巴黎公社的标准衡量，持批评和保留态度。他们认为“革命委员会”是改良主义的，群众代表、革命干部、军队负责人的三结合，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形式，而造反派在各级革命委员会中，基本都不占领导地位。他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只有作为向巴黎公社式政权过渡的形式，才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实际的发展却是背道而驰。

极左派还反对军队。因为当时只剩下军队官僚还起作用。他们认为军队走资派与地方走资派利益一致，不可能自觉地执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所以赞赏各地造反派向军队夺枪的行动。

杨曦光和极左派鼓吹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招致镇压的事实，说明他们的主张违背了毛泽东的文革目标。毛泽东心目中的文革不是反官僚阶级的社会革命，也不是反对官僚制度的政治革命，而是党内斗争。毛泽东对官僚现象有所不满意，有所批判，但是没有明确指出这是制度的产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目标不清，决心不大，给人虚晃一招即鸣金收兵的印象。

#### ◇ 享有个人崇拜地位的毛泽东凌驾于全党之上

凤凰历史：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党内官僚的特权，而且他自己也确实曾多次表现出对官僚体制的厌恶，比如指责“城市老爷部”“帝王将相部”，但是我们又看到毛泽东本人就享受很多特权的事实。对这种现象您怎么看？

印红标：毛泽东凭借个人崇拜的地位已经凌驾于全党之上，掌握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生命，驾驭整个官僚群体。居高临下俯视官僚群体的地位，使他有可能指出官僚中的阴暗面，而不致殃及自身，然而他没有根本改变官僚体制的决心和战略。

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革命家集团演变成主宰整个社会的官僚集团是规律性的现象，苏联、中国、南斯拉夫、朝鲜概莫能外。就这一点而言，极左思潮的论点是有洞察力的。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有没有可能在消灭私有财产制度之后，建立没有官僚的社会？至今还有成功的案例。具体到文革时期的中国，极左派对官僚特权阶层的剖析，揭示了现行制度的弊病。具有分析和批判的深刻性，而在实践层面，如果依照这一派的具体主张去做，则只会加剧动乱。这又是一个乌托邦的矛盾体。

凤凰历史：他们是很好的病理学家，但不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印红标：可以这样说，你的这个比喻很到位。现在一些左派把文革理想化了，他们能够自主地言说而不必担心杀身之祸，这是在改革之后相对开放的中国才有可能的事情。设想在文革时期，左派观点也难免遭到打压直至镇压。

凤凰历史：在老红卫兵、造反派和极左派心目中，毛泽东是什么样的形象？区别大不大？

印红标：各派青年都崇拜毛泽东，他们心中的毛泽东不尽相同。

在老红卫兵心中，毛泽东是带领他们父母打天下、坐天下的伟大领袖，是他们的“主席”。当时，称毛泽东为“主席”而非“毛主席”，是某种政治地位的表现。中学生当中能够学着父辈的口气“主席”长，“主席”短的，唯有老红卫兵。父辈的革命业绩，是他们谋求政治社会优先权的依靠，即所谓“自来红”。他们期待在文革中跟随毛泽东，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育路线冲击，打击阶级敌人，建功立业，却是误解了毛泽东的文革，反遭毛泽东打击。他们不能理解，革命怎么能革到“当然接班人”头上？事情一定坏在江青身上！

保守派心目中的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而毛泽东已经是高居于党之上的主宰者了。保守派是党组织和当权派培养，并依靠党组织的群众。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恰恰是不按常规办事，绕开党的组织体系，自下而上从基层、从党外发动群众，冲击党政领导当权派，揪出走资派。保守派对此始终难于理解。

造反派认为毛泽东始终是被压迫者的伟大领袖，不仅是旧社会被国民党压迫的人民的领袖，还是新社会被当权派压迫的人民的领袖和解放者。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地协助为被工作组打成右派的学生平反，江青是最早批评“血统论”的高层领导人，这显然是遵循毛泽东的旨意。当时的一段流行语，反映了造反派的情感：“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然而，毛泽东支持造反派，是要把造反派纳入他的党内斗争轨道。打倒刘少奇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那些不听招呼、自行其是、难以驾驭的造反派人物先后遭到清洗。很清楚，造反派在党内高层的支持者只有毛泽东和江青文革派，其他当权者基本视造反派为仇敌。一些造反派头头至今感恩毛泽东把他们从被当权派打压的苦海里解救出来，而不计较后来毛泽东放手当权派对他们的打击。

极左派是有思想自主性的学生，毛泽东在他们眼中是领袖，却不是神明，因而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阐发毛泽东的观点，实际上与毛泽东争夺文革的阐释权，遭致镇压。

正是由于这些红卫兵的处境有很大的差别，所以都说是跟毛泽东干革命，但是到了违背自己利益和思想的时候，就止步不前了。比如，老红卫兵在批斗学校领导、教师和教育路线时，“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待到文革冲击到老干部即他们的父辈亲朋时，就“抗争”了。造反派口口声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到了自己派别利益形成时，也对毛泽东指示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了。

凤凰历史：所以对参与文革的人来说，在满怀革命激情的口号背后，其实还是有政治利益的考量？

印红标：毛泽东是魅力型的领袖，能号召其他人跟着他走，但是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实际上不是那么简单。文革群众运动中，人们往往有小我、小算计。他们对毛泽东的指示，顺耳的，会很积极；不顺耳的，也会跟着走，但是步子会慢一点；如果触犯了自身利益，就会变得不理解，执行得很不得力，甚至阳奉阴违了。对此，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那本书里有很深入的考察和论述。

◇ 如不彻底反思，群众还会用文革方式解决社会矛盾

凤凰历史：您觉得反思文革现在还应该被当作敏感话题吗？

印红标：我一直觉得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必须深入研究，不论是否敏感。应当指出：文革史研究的敏感性已经下降了很多，越来越是历史的、学术的问题，其敏感性越来越淡了。现在有争议的是：有没有必要继续把文革列为敏感问题，限制研讨。

80年代中期收紧文革研究的政治考虑大概是：中共中央已经说文革是全局性的错误，大家不要揪着不放了，担心会影响党的威望和执政合法性，也担心影响党内外团的团结，比如在这个问题上你整过我，那个问题上我整过你，清算起来纠缠不休，不利稳定和经济文化建设。

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遮蔽、隔离了四分之一世纪，致使中青年一代不懂文革是怎么回事，对文革议题失去了鉴别力和免疫力。含有文革错误因素的活动在某些方面开始重现。限制文革研究成了不利长治久安的因素。

中国需要文革史的再教育，应当促进大众了解历史事实，接受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在这方面，学术研究和教育界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凤凰历史：现在对文革的反思会有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印红标：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社会大发展，社会矛盾也有尖锐化的趋势，应该用什么方式解决矛盾？是不是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来解决？如果不教育群众，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还可能有人试图用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去解决。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部分民众承担了改革的成本，而较少分享改革的红利，成为贫富分化的利益受损者。毛泽东在群众中进行相当深入的教育和动员，其影响直至今日。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群众冲击领导的模式，但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已经说明这种方式不可行。文革群众运动冲击领导的结果是，旧的领导人被打倒了，新上来的很快就走老路，其作为往往不及老干部。1974年广州“李一哲”大字报就引用列宁的话说：新贵还不如老贵。

文革新贵最突出的是政治腐化。规矩被打破以后，新贵为所欲为，打击不同意见的人，而新贵的子女可以一出高校校门便身居高位。最突出的例子是：林彪之子林立果离开大学之后，很快就被任命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是很不正常的。更不必说文革中后期秩序混乱，经济长期徘徊，民生困窘。

文革对领导者打击很大，但是被领导者也应该总结教训，不是说以任何方式反对官僚压迫都是有利民众的，可取的。事实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解决官僚压迫的出路。逐步争取用民主法治、舆论监督的方式监督官僚，比打倒官僚、游街、批斗等方式强得多。不能美化文化大

革命，将民众引入歧途。

□ 原载《凤凰网历史》2014年4月11日

~~~~~

## 【历史问责】

真相是和解的前提

• 章立凡 •

2014年1月12日，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博士声泪俱下的道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赞成、反对、感动、冷漠、质疑、不屑、嘲讽……，各种腔调的声音不绝于耳。

### ◇ 历史的符号

在原师大女附中“老三届校友与老师见面会”上，该校“文革”初期“师生代表会”主席刘进、副主席宋彬彬，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宋称老校长卞仲耘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她还表示：“请允许我表达对卞校长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没有保护好校领导，是终生的伤痛和懊悔。”

首先须肯定：一个人到了晚年，对于年轻时犯下的过错乃至罪愆，道歉比不道歉好。

其次要等待：受害者卞仲耘老师的家人是否接受道歉？他们并没有出现在道歉会场，态度至今不得而知。

其三需思考：到目前为止，卞仲耘之死仍是一个“葫芦案”。宋博士不止一次地道歉，同时也是在切割责任（她认领的是“道德责任”，而不是法律责任），把球踢到了另一些人的脚下。留下的思考题是——直接的打人真凶是哪些人？

宋彬彬之所以成为“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是因为她曾与好几个“第一”沾边：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成为“文革”中全国因武斗致死的第一位受害者；该校因而成为第一个打死老师的学校；当时宋彬彬是该校“革命师生代表会”副主席之一，她在8月18日作为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作为第一个有名有姓的红卫兵人物，被媒体广泛报道。

当伟大领袖得知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时，轻松吐出三个意味深长的字——“要武嘛”。两天后，《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红卫兵’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首次传达了毛的口谕，并宣称：“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从‘彬’到‘武’，这反映了人们思想的一个大变动，反映了革命的小将在成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要武嘛”的“最高暗示”，激发了全国第一轮的武斗和抄家狂潮，史称“红八月”。这场有组织的暴行，得到了高层及公安部门的支持和纵容，很多地方的派出所向红卫兵提供了管段内“牛鬼蛇神”的名单和地址。谢富治在“红八月”中的一次公安干部会议上，对武斗作了论



释：“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据官方不完全统计，8月至9月的40天里，红卫兵仅在北京一地就打死了1772人，狂潮从北京蔓延至全国。

在重大历史节点上的短暂亮相，给世人留下了抹不去的记忆。被权力利用过后，“宋要武”成为那个暴力年代的一个历史符号，如影随形伴随着宋彬彬的人生。

#### ◇ 历史的问责

“文革”结束后，赴美留学并工作的宋彬彬，不断遭遇历史聚焦：芝加哥大学历史学者王友琴博士撰文，认为宋彬彬等对卞仲耘之死负有责任；卞校长的丈夫王晶垚先生，不仅保存了亡妻的血衣、遗体照片和遗物，且数十年不懈地搜集证据，他手中还握有一份在邮电医院死亡现场的《宋彬彬谈话纪要》，且一直未接受宋的道歉。……

四面楚歌的宋彬彬，多年来一直在不同的场合否认参与打人，否认改名，否认自己是《光明日报》文章的作者，否认与王晶垚见过面……。同时不断有人暗示：打死卞仲耘的主凶，比宋彬彬的家庭更有背景，她是在代人受过。刘进、叶维丽、冯敬兰、于羚等校友，自发组成了八五事件调查组，将责任指向了本校高一3班的少数干部子女。据叶维丽回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老有两个人的形象在晃，都是高一的。一个大胖脸，一个瘦高个儿……”冯敬兰在道歉会结束后新发表的文章中说：“发起者、打人者多为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初中在女三中、女八中就读，1965年9月，通过中考她们进入女附中。”

道歉会通过老教师及一位受害者子女之口，表达了对宋彬彬等人的谅解，且指打人者当时是未成年人，从法定年龄上不能承担法律责任。调查组在距真相一步之遥处裹足不前，不愿说出虐杀事件的直接责任人（她们早已是成年人）。时至今日未能还老校长一个公道，令这场校友内部调查的公信力打了折扣。

共和国的同龄人有句口头禅——“青春无悔”。鲜见有手上沾过血的人，勇敢地站出来承担责任。按照“法不责众”的“国民性”传统陋规，国人对于参与集体犯罪，历来缺乏道德上的反省，认为“大家一起沾血”的恶事可以免责，这也是那个时代“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政治运动大行其道的原因之一。

在“文革”祭坛上的千千万万个冤魂中，卞仲耘校长只是其中之一，她被自己按体制设计教育出来的学生夺去了生命，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宋彬彬打死人的直接证据。若要她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责任，当然是一种不公；更大的不公则在于：大规模集体犯罪的主使人、十年浩劫的发动者，刚刚接受过最高规格的祭祀荣典。

#### ◇ 真相与反思

体制的暴力基因，潜伏于从湖南农民运动、苏区“肃反”到土改、镇反运动的历史血脉之中。在一种互害体制下，宋彬彬等“红二代”及其家族同样没有安全感，他们既是体制的受益者，又随时可能成为受害者；或许后来重新成为受益者，而其精神救赎之路则漫漫其修远……

曾长期居住在以基督教文明为主、认同普世价值的国度，难免耳濡目染，接受忏悔文化。宋彬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希望通过道歉“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远”，“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刘进道歉发言中的反思更为深刻：

1、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尤其是党报舆论把革命与暴力等同起来时，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以为采取更激进的方式，才能证明自己最革命。

2、卞校长死于校园里的暴力，而少数施暴学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为什么文革初期以干部子弟为首的所谓“红五类”成了暴力活动的主力军？因为当时的教育告诉你，你是革命事业的当然接班人，因此，当革命事业出现危机的时候，你要像父辈那样责无旁贷地站出来捍卫。这种由“血统论”带来的接班人意识与领袖崇拜造成的盲从意识，必然会引发无法无天的暴力行为。

3、阶级斗争教育强化了血统论和等级观念，将学生无形地分成三六九等，造成了学生的分化，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最终导致了学生斗学生、学生打老师，无视生命，侵犯人权。这种流毒延续到了今天。

4、八五悲剧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或团体都不得超越，生命才有保障，人民才有安康，国家才有安定。

以陈小鲁、宋彬彬、刘进等为代表的部分红二代，虽早已不在权力中心，但从血缘感情出发，仍希望父辈创立的红色政权长治久安，提防“文革”卷土重来。从不断自辩到促进反思，以道歉求和解，避免社会的彻底撕裂，当然是一种最明智、成本最低的“维稳”，可惜尚未被诸多红色后代所理解。

#### ◇ 道歉与和解

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对这场浩劫的受害者，至今未见官方有公开的正式道歉。以“真相”“反思”“和解”为基调的女附中道歉会，本应是一场政府主导的社会行动，可惜与主旋律不同调。历史的还原和认真反思，不时被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帽子。

翻开沉重的历史：从卞仲耘到北京市被打死的1776条人命，从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的大屠杀到广西的吃人狂潮，还有多少人道主义灾难的真相尚未公布？“文革”“反右”等政治运动和重大历史事件，整死、杀死了多少人？三年大饥荒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这些历史的债务并非“虚无”，岂是区区一句“历史虚无主义”即可风吹云散？

某历史责任人说过：“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历代皇帝下罪己诏的，没有不亡国的。”纵观二十五史，历代君主的罪己诏或不下数百道，多数没有遭遇亡国；而不知悔悟者却颇有亡国的先例。若出于对“亡党亡国”的病态恐惧，乃致讳疾忌医，连以往的政治得失都不能检讨了，可不像是谋求千秋万代的计策。

不久前逝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曾在图图大主教的提议下，于1995年签署《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成立由独立人士组成的社会调解组织“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弄清过去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促进全国团结与民族和解”，主要从事如下工作：

1. 全面地调查自1960年3月1日至1994年5月10日这段历史时期内各种严重侵犯人权事件的真相；
2. 让受害者讲出真相以恢复他们的公民尊严，并提出如何对这些受害者给予救助；

3. 考虑对那些服从政治指令严重侵犯人权但已向真相委员会讲出所有事实真相的犯罪者实施大赦。

现代社会中负责任的政府，不会在人类文明的高速路上逆行。清理历史的负资产，就国家历史上对公民造成的伤害公开道歉和赔偿，促进全社会的和解，是执政者的道义和担当。美国政府曾就历史上对印第安人、黑人、华工、日裔公民的伤害，先后作出道歉及赔偿。海峡对岸的国民党也身先垂范，台湾领导人马英九，每年都会出席“二二八事件”的纪念仪式，向已平反的受难者及其家属鞠躬致歉。

上文提及的道歉会纪事中，有这样一段话发人深省：

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没有反思，就没有道歉。道歉是铭记历史、寻求和解的开始。

2014年1月15日风雨读书楼

□ 原载：财经网名家博客（《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删改）

~~~~~

### 【史海钩沉】

#### 李仲公“伪造贺龙信件”之疑

• 李 芳 •

国务院参事李仲公（贵阳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上交贺龙早年写给他的两封信而作为“陷害”贺龙元帅的人证物证。在贺龙元帅平反过程中，李仲公拒不改变当年的指证，后来被“李仲公审查小组”定性为“伪造信件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反革命事件”，并报中央批准，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民间谓之“李仲公事件”）。几十年过去了，可谓尘埃落定，“为尊者讳”之风已成历史烟云。为探求事件另一面真相，笔者搜集到一些相关史料，整理此文，权作史实争鸣。

#### ◇ 事件发生前后

1949年6月，李仲公通过郭沫若与周恩来联系，随后参加“京沪杭立法委员起义”，通电脱离国民党政权，拥护中共的领导，8月自苏州赴北平。周恩来通过有关人士转达李仲公：“拟待西南解放后，安排回西南工作”。其间，1949年9月8日和9月13日，周恩来、林伯渠联名邀请李仲公到御河桥军管会聚会。李仲公于1949年10月16日撰写了《贵州与解放后之初步政策》一文呈报周恩来总理。

1950年7月，李仲公应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周总理问李仲公：有人说重庆“三·三一惨案”是你传达蒋介石命令的。李仲公作了否认的回答，并要求总理追查。总理对他说：“如果我相信此事，又何必邀你来京呢！”。重庆“三·三一惨案”，是指1927年3月31日国民政府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屠杀杨暗公等共产党人的历史事件。惨案发生前的3月15日李仲公在武汉被拘捕，扣押至5月17日始由邓演达保释，遂无向刘湘传达蒋介石之命的可能（许多年后，陈毅副总理通过国务院参事李奇中转达李仲公：重庆“三·三一惨案”之事已查清，与李仲公无关）。周总理曾指出“你从前虽然不赞成蒋（介石）反共，后来也反蒋，但你可以做邓演达而不做，革命的立场终是摇摆的……”，这也许是当年中共对李仲公的评价。李仲公感觉到总理拟安排他回西南工作的意图受阻，遂以年老体弱，要求留在总理身边工作。

李仲公是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进入参事室的，后来亦未参加任何民主党派。他在政务院、国务院参事室历任西南区组召集人、学习组长，可以说是得到周总理信任和肯定的，并与周总理常有工作上的联系和交往。与副总理陈毅、郭沫若时有往来，因同好棋艺、诗文，常受陈副总理邀去对弈、喝酒咏诗。与同室工作的民主人士周士观、李一平、陈修和等老参事保持着长期的友谊。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担任国务院法规编纂委员会委员；参加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的撰写，担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参加全国政协及参事室的视察调研活动，积极向总理进言献策。在“反右”运动之后，经常应邀列席最高国务会议。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在一片揭发所谓“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的历史问题之声浪中，根据严文仲（身份不详）的揭发材料，1968年2月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头目靳海东到李仲公家中找到李仲公调查贺龙的历史问题，李仲公如实地将他与贺龙的关系作了陈述。随后，中央专案组数次到李仲公家逼迫其交待贺龙“通敌”的情况及交出“贺龙的信件”。4月初，李仲公将从家中找出的贺龙写给他的两封“亲笔信”，通过参事室与周总理的联络员将其上交总理办公室。当时中央专案组还说他“立了大功”。

据李仲公次女李幼华介绍：在其父未交出贺龙信件之前，专案组直赴苏州四井巷李仲公、吴澄华（李妻）原居住地进行挖地三尺式的“抄家”，并将居住在老屋子里的吴澄华之妹吴澄娴以“反对江青”为名抓捕入狱，迫害至死。“抄家”、“捕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贺龙的信件。

数年之后，在中央要为贺龙元帅平反的过程中，必须推翻贺龙身上的一切“罪证”。童小鹏受中央委托找李仲公直接谈过两次话，最后一次谈话是1975年1月10日下午由参事室派车送到中央统战部接谈的。而李仲公不改当年的指证，并于1975年1月20日向中央呈报了《我是根据什么的证据和理由来肯定贺龙当年曾有过叛党罪行的》，对当时指证李仲公提供的“假信”进行辩驳。1978年5月26日，有关单位对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信进行了结案报告。作出《对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李仲公，男，现年88岁，原籍贵阳市人，原任国务院参事。关于1968年春李仲公交出的两封伪造信陷害贺龙同志的问题，审查小组报经中央批准，认为这是李仲公配合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蓄意陷害贺龙同志的一起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李仲公罪行严重，又不老实交待。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本应从严惩处，逮捕查办。但考虑李已年近90、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不再捕办，决定撤销其国务院参事职务，每月发给生活费80元，交国务院参事室监督。”

#### ◇ 信件“伪造”疑云

纵观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也体现着它们的多面性。就李仲公“伪造”信件“蓄意陷害”贺龙之说，不从当年复杂的历史背景去思考和分析，都是不客观的评说。因而，笔者根据公开出版发行的报刊书籍和当事人亲属所提供的历史资料，对此提出质疑：

一、李仲公次女李幼华根据她的亲身见闻，撰写了《李仲公上交贺龙两封信的前前后后》（见本刊zk1001c——编者）。将其父与贺龙的所谓“恩怨”作了一些交待，但有许多细节她是无从知道的。此文根据李仲公留下的遗物从当事人的角度向世人公开了贺龙两封信的内容，以及李仲公被中央专案组追逼并两封信的上交去向，应该说是真实可信的。贺龙当年的两封“亲笔信”的转交过程，在国务院参事室编印的《国务院参事室大事记（1949年—1998年）》的记载中得到印证。这里不作重述。

二、从目前公开出版发行的一些资料，如刘秉荣《建国后的贺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发行）、李海文《华国锋受命调查贺龙元帅冤案》（《党史博览》2011年第2

期)等系列文章,交代了“李仲公事件”的始末。军旅作家刘秉荣系总参《贺龙传》编写组成员,可以说直接接触过有关贺龙的档案资料,其使用的资料应该是真实可信的。《建国后的贺龙》第四十五章《李仲公的诬陷》中所引李仲公向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靳海东提供的“恶毒”文字材料(见《建国后的贺龙》第323页),在李仲公的笔记中得到印证,说明是根据第一手材料撰写的。罗美元《李仲公陷害贺龙始末》(《湘潮》2010年第5期)所采用史料与之几乎一致。但是,贺龙的两封信的内容,与李仲公当年留下的抄录件却有个别文字差异。《李仲公的诬陷》一章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交待:

“第一封信写道:……第二封信写道:……李仲公还为此写了说明:1929年5月中,我连接到贺龙请我代他向蒋介石解释、愿意投蒋的两封亲笔信(署名贺云卿,云卿是他的字)。我之所以交出这两封信,因为这是贺龙叛党的铁证。李仲公亲笔。1969、12、26于北京。李仲公为了让人相信他伪造的信,还画了信封的格式: / 专呈交通部李次长仲公勋启 / 贺云卿上 / 专案组拿到李仲公伪造的这两封信后,讨论时有两种意见,……”(见《建国后的贺龙》第324至325页)。

通过这段文字,说明贺龙专案组从李仲公处拿到了画有信封格式的贺龙两封“亲笔信”,实为李仲公的“抄录件”而存入历史档案。这一“抄”就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既可以作为贺所谓的“罪证”,又可以作为李伪造的实据。根据李仲公留下来的1969年12月26日出具,并盖有“国务院直属口法制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房产管理局、参事室大联合委员会调查材料专用章”的《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证实中央专案组赵、王、张三人(未出具名字)找到李仲公,得到贺龙的“两封信”之事。而李仲公在自己最早留存下来的两封信录稿旁加注文字曰:“这两封亲笔信已于本年四月初交参事室造反派张V、秦萍两同志通过联络员转呈周总理”(“本年四月初”即1968年4月初)。那么,贺龙的两封“亲笔信”原件,通过参事室早已转交给了周总理办公室,很显然1969年12月26日李仲公再次交出的只能是凭记忆写出的抄件。事隔将近一年零八个月,凭其记忆抄录自然就会有个别文字上的差错。

几年后,1974年9月,从中央专案组文档中拿出李仲公的抄件来做技术鉴定,认定李仲公“伪造”一点也没有冤枉他(放了几年的纸张作旧,是很简单的事,不是什么难题)。那么,1968年4月初李仲公上交给周总理办公室的那“亲笔信”的原件又到哪里去了呢?这就是这桩悬案难以解密的关键所在。

在为贺龙彻底平反,追查李仲公上交的两封信件过程中,办案人员将“鉴定结果”上报华国锋、周总理,并建议严惩李仲公。总理最后表态说:“把调查结果告诉他就能把他吓死。算了,他已经80多岁了。”这也许就是周总理放过李仲公的原因之一吧。

而当年几次登门“积极动员”李仲公“检举揭发贺龙”的急先锋——北京体育学院造反派头目靳海东等人,事后反戈一击,把李仲公说成是“有预谋”、“有准备”、“很积极”的行为。李仲公是个文人,有作笔记的习惯,对外发言谈话都会事先打个草稿,以增强记忆,这是很正常的行为。同时,李仲公作为国务院参事,有权利直接向总理反映任何问题,并且通过国务院参事室转送材料,没有违反组织程序。况且,李仲公与林彪、“四人帮”集团中的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任何一点历史渊源及社会关系,就其地位可以说连边都沾不上。

三、李仲公生前对指控他提供贺龙“假信”的辩解(当时并没有直接指证是他“伪造”)。李仲公的处理决定是在他住医去世前4天(即1978年6月16日)参事室领导对其家属宣布的,家人见他病重,没有把处理决定告诉他。那么,为什么公安部早在1974年9月23日就有“伪造信件”的鉴定结果,审查小组不直接去找李仲公对质呢?而要等到李仲公“不能开口”将亡之时才对其家人宣布处理决定,这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有奥妙。

李仲公在上交的《我是根据什么的证据和理由来肯定贺龙当年曾有过叛党罪行的》(留存手稿)中说:“……我把这封信送呈周总理,也就是为了可供中央审查。但是,前几天,统战部童小鹏主任为了本事件约我去会谈,经过两次的讨论,尽管童主任说:‘总理一见此信,不但说不是贺龙的亲笔信,而且说是假的’。但我仍然不改我原来的观点……当我把这两封信送呈周总理之后,先后就来了好多位。中央军委却前后派了很多的人如刘士艺、朱延兴、周栓增、李德儒、尤学桂等军人同志(都经过参事室介绍,都是中共中央委员,惟姓名写得潦草,是可能有错误的)前来访问调查关于贺龙的事件,其中我是写了几份较翔实的经过情况交给他们携去转交中央作审查材料的。……如果中央加以全部审查,究竟那封信是真是假,或者认为我是认假成真,那么,中央对我如何处治,我就敬候中央的处治。”事发当时李仲公并不知道贺龙被迫害致死,而他的这些辩解,虽是一面之辞,不是没有道理的。

众所周知,贺龙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遭受迫害,是林彪、康生、江青之类的中共高层人物要迫害贺龙在前,并于1967年9月由毛泽东拍板“同意”正式立案审查,而后(1968年2月底)才有逼迫李仲公揭发并交出贺龙当年的两封信的“罪证”之事。所谓逼迫,自1968年2月北京体育学院靳海东造访李仲公开始,从李仲公接到的专门调查贺龙问题的《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来看,中央专案组前后就有许多人分数批(出具的《调查证明材料介绍信》日期分别为:1968年2月29日、1968年4月12日、1969年12月26日、1970年10月17日、1971年3月2日等,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出具介绍信之后,以后来访就径入李仲公家中)纠缠着李仲公,采用引诱、威胁等“革命”手段迫其一次又一次的反复交待。试问,那个特殊年代,那个特殊时期,又有几人在中央专案组的面前不被屈打成招(或“弄假成真”、或“弄真成假”)而造成许多冤案的呢?针对贺龙遭受迫害事件,有的“文革”史研究者曾如是说:信件的真伪,对贺龙不是重要事情,对李仲公是重要事情。……将贺龙打为叛徒的过程是荒谬的,涉及李仲公作伪证的过程同样是荒谬的。“文革”悲剧不堪回首,“文革”教训值得吸取。希望中国不要再上演这样或相似这样的惨痛悲剧!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

□ 《文史天地》2013年第12期

~~~~~

## 【读史札记】

### 评党校教授的一篇漏洞百出的作文

• 文 贝 •

#### ◇ 不敢恭维的党校生

在《中共党史与当代中国史》上看到一篇文章《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写在毛泽东逝世暨“文化大革命”结束32周年之际。作者:韩西林 2008年4月。文中除了开章引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定论,以体现文章与主流思想合拍外,许多史实和观点错误与漏洞很多。

作者是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一方面理解他作为体制内“教官”与中央保持一致“教化”党员的职责所在,另一方面又对这种戏说和阉割历史事实感到担忧。

笔者向来对党校不屑一顾,虽然多年来打着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培训、教育,却很少能真正提高政治思想观念和科学文化水平,更况且是提高学员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

察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至于它所承担的党的建设理论研究任务，除了照本宣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紧跟政治形势，把执政者的“理论”新发现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里寻找理论根据。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为权力者发文凭，给他们的资历增砖添瓦，或者是休息一下。

中国干部里有党校学历的干部据说超过300万人，党校文凭享受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待遇以前有明文规定。虽然2008年中共中央下发《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条例》，删去了原来《暂行条例》中的第24条关于“授予党校函授教育学历”的内容，却仍然明确规定：中央党校和具备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党校，依法取得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并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同意后”，招收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

其实在中国，干部中的假文凭远没有混文凭多，而混文凭又以党校为最。皆因很多党校只要交钱挂个名，到了时间就可以颁发本科甚至研究生、博士文凭，升官时就是一个硬棒棒的“软件”条件。

干部间在一起打牌，谁要出了张臭牌，经常有人会来一句“你小子的学历一定是党校发的！”。言外之意是党校学历没有真才实学。

当看了四川党校教授韩西林的文章后，感到买张假文凭不一定差于天天坐在课堂上听这种党校教授讲课。假文凭只是没有上过课，而听这种胡编滥造历史的党校教授讲课反而会被误导，或者叫“思想致残”。

请看韩西林文章以下文字：“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毛泽东采取了一些关键的防范措施。首先是调38军入关。安全问题最终决定于军队。北京军区拥有十余万野战部队，司令员杨勇，原是彭德怀手下大将，政委廖汉生又是贺龙外甥，这种情况使毛泽东不放心，他开始考虑另外调部队来保卫北京。林彪旧部、沈阳军区38军成为首选。1966年2月，春节刚过，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联席会议，着重谈了北方叁大军区的战略任务。在会上他大谈与苏修之战迟早要打，要立足早打大打，打热核战争，在中苏近万里的边境上全面展开，要求与会各位多考虑战略战术问题，练好兵准备打仗。会后毛泽东以研究北方防线战略战术问题为由，将杨勇留了下来，实施监控；由廖汉生回去布置河北省境内部队春季大练兵，千里野营，并组织军区所属正师级以上高级将领由廖汉生亲自率领，赴中蒙中苏边境视察并检阅部队。这样，北京军区几乎成了一座“空城”。而就在此时，驻守在山海关外的机械化王牌军38军，正悄悄移师，穿越万里长城进入河北地界。大军沿人烟稀少的燕山山脉南下，一直行进到北京外围的密云、昌平、延庆、房山一带大山里扎下营帐，完成了对北京的包围。其次，1966年3月中旬，毛泽东和林彪突然下令改组北京卫戍区党委及司令部、政治部。同时，派出多个军事接管小组，由师级干部任组长，各率领一个连，于同一晚上，分头进驻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北京日报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第三，加强首都警卫力量，“增加了卫戍师”，即对北京卫戍区进行扩编。5月27日，军委命令，将原属公安部队总部指挥的首都警卫师、北京市公安总队及陆军第63军所辖的第189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首都警卫师改称警卫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警卫第2师，189师番号不变。6月15日，军委电示，将陆军第24军所辖的第70师，调归北京卫戍区建制，番号不变。扩编后的北京卫戍区拥有了四个师的建制。这个措施是为了“防变”，对此毛泽东也并不讳言。”。

“在完成了这些准备以后，毛泽东才真正开始放手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当时确实是有孤注一掷、背水一战和拼个鱼死网破的思想准备的。”

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 38军移防保定是1967年2月

1967年2月15日，军委电令：“奉毛主席、中央命令，为了更好地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加强战备”，决定对陆军第21、69、38军的部署，做出调整：21军，由山西移驻西安、宝鸡地区，由北京军区调归兰州军区建制。驻甘肃平凉地区之陆军第62师，归还21军建制。69军，由河北保定地区移驻山西，接替21军防务。38军，由吉林通化地区移驻河北保定地区，接替69军防务，由沈阳军区调归北京军区建制。

军委又令：“以上部队接到命令后，应迅速做好行动准备，尽快开动。21军、69军务于3月5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38军务于3月8日以前全部到达指定地区”。

38军军史：1967年2月15日凌晨4时许，受领移防预先号令。当日，军部分主要领导即乘飞机先期到达。16日0时15分，受领沈阳军区转“部署调整”电令，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第334团1营乘火车离开通化，从下达预先号令到第一列列车发出，中间仅有三天时间。

欧阳青在《谢振华四进山西》中说：“1967年阳春三月，在“全面夺权”之风刮遍大江南北之时，中央军委对全军有关部队实施换防。谢振华奉命率六十九军从河北省省会保定市移驻山西省省会太原市。”

陈路在《谢振华少将》一书中说：“1967年刘格平夺了山西的大权后，山西内乱不已，周恩来提议将69军从河北调入山西，担负支左和部分厂矿军管任务，以确保我国煤炭基地的正常运转，当时谢振华是69军军长”

《山西文化大革命概述》中：“2月下旬至3月上旬，奉军委命令驻山西太原等地的陆军第21军移防陕西省；陆军第69军从河北省保定专区移防太原等地并进行三支两军工作”。

38军虽然是第四野战军麾下，但此时的军长李光军来自于新四军和第三野战军，政委王猛出身于第二野战军（刚接任于敬山政委职务两个月）。38军初抵新防区，于2月24日奉命与省军区一起担负保定地区的支左任务，军长李光军、副军长刘海清、副政委邢泽负责三支两军任务，政委王猛负责管理军队。

韩文把38军说成是林彪旧部显然是想说明38军是林彪嫡系，以增加调兵的私人因素。其实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军队不在于部队的隶属关系，而在于指挥员的倾向性。终究军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长和政委两位军政主官基本可以主导这支部队的走向。

◇ 北京空城说站不住脚。

1966年5月，隶属于北京军区的有驻山西的21军、驻承德的24军、驻太原的63军、驻张家口的65军、驻天津的66军、驻保定的69军。北京城周围还有归装甲管辖的驻南口坦克第六师及驻蓟县的坦克第一师及各军兵种独立师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两个师及公安部队。何来北京空城说！

加强北京卫戍区力量的建议是周恩来和叶剑英提出的。



1965年12月8日至13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央做出解除罗瑞卿军委秘书长及总参谋长职务。由叶剑英兼任军委秘书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办公厅代主任。

1966年1月8日，中央增补陈毅、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为军委副主席，加强军委领导。

1966年5月15日，周恩来、叶剑英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提出报告，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

1966年5月17日，周恩来致函毛泽东请示：“关于北京卫戍部队，经过与杨成武同志与北京军区协商，拟调63军驻石家庄的189师和65军驻张家口的193师担任。卫戍司令即以原副司令傅崇碧同志担任，待报请林彪批准后，便着手进行调动。”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办。（见周恩来年谱）（后来193师改为70师）

北京卫戍区进行扩编为四个师，分别是189师、24军70师，首都警卫师改称第1师，北京市公安总队改称第2师。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兼任司令员，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黄作珍担任第二政委（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为第一政委）。中央同时规定，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

同时，中央在1966年2月28日决定，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包括各省的公安总队约38万人于1966年6月30日全部进入军队序列。

此次加强北京卫戍区部队显然跟林彪没有关系，具体操作人是周恩来、叶剑英和杨成武。

韩西林文章故意把增兵北京卫戍区部队提前到文革开始5月16日之前的3月中旬，显然是为了他后来“在完成了这些准备以后，毛泽东才真正开始放手发动文化大革命。”做铺垫。而所谓的“派出多个军事接管小组，由师级干部任组长，各率领一个连，于同一晚上，分头进驻人民日报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北京日报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报大楼等要害单位。”纯是意淫！1966年3月军事接管国家新闻媒体单位简直是天方夜谭，充其量是北京卫戍区部队正常的换岗。

38军调防保定的时间是1967年2月，何来1966年2月之说？此时距毛泽东解决北京市“独立王国”已经过了将近十个月。是文革中发生的事，并非是在文革前夕，何来“在完成了这些准备以后，毛泽东才真正开始放手发动文化大革命。”！

至于说“毛泽东当时确实是有孤注一掷、背水一战和拼个鱼死网破的思想准备的。”更是弱智。毛泽东连发动文化大革命研究下发《5.16通知》的中央会议都交由刘少奇主持，自己在外地根本不回来参加。担任军委主持工作的副主席林彪长期在外地休养，军委工作交由贺龙和叶剑英负责，而且当时的调兵权基本在周恩来手里（文革前军以下军官的任命由国务院总理签署），这是拼个鱼死网破的架式吗？

一篇文章出现如此大违背事实的错误要么是不学无术，要么是别有用心。这种党校教授教出的学生除了会造谣外，还能干什么？好孩子也被这种教授教坏了，况且这些到党校进修的干部很多本身就是“带病听课”。也无怪党的许多干部既没有水平又糜烂透顶，与教育有很大关系。

□ 来源：文贝博客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页：//www.cnd.org /

---